

“他者”的悲歌 ——希腊神话中女性抗争的文化阐释

李昌其

(怀化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系,湖南 怀化 418008)

[摘要] 希腊神话以悲剧的形式,通过大量生动哀婉的故事,展示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架构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及各种抗争,从文化层面诠释了女性抗争的合理诉求和价值意义。

[关键词] 悲剧命运; 话语权; 文化超越; 危机与出路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101-04

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一直被视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奇葩,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神话以其特殊的方式记录了原始社会丰富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心理,记载了人类社会从母系到父系的演化,也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根系。”^[1]神话从悲剧视角出发,通过大量生动哀婉的悲剧故事,将女性的懦弱与坚强、顺从与抗争等品质充分地展现出来。不仅从文化层面真实反映了早期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架构下女性的生存现状,同时,更多地对早期人类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和价值提出了文化质询。

一 被物化的悲剧性命运

“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2]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不幸命运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遭遇,只是把它看成神祇惩罚人类的一种政治工具的预设,而这种预设正是从对女性的建构开始的。

“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中,女性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3]神话中,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都是以女性为原初的行为对象。在普罗米修斯盗得天火给人类后,天神宙斯为了惩罚人类创造了美少女潘多拉:雅典娜和美惠女神给她穿上阳光般耀眼的华丽衣裳,并给她戴上黄金的项链;时序女神给她戴上春天香花编成的花冠;赫耳墨斯赋予她狡猾和机智,以及撒谎和谄媚的语言技巧;爱神阿芙洛狄忒则赋予她一切女人的媚态。“每一个天神都给了她一些对于人类有害的赠礼”,并且在她那最使人迷恋的外表下面,宙斯还设置了一种“眩惑人的灾祸”。很明显,

潘多拉的诞生,只是作为一种性的存在和政治工具而被创造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女性是为男性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3]女性的存在从本质上被颠覆,成了被男性阅读、言说和操控的对象,并为以后神话中通过性政治进一步贬抑女性和支配女性提供了文化依据。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人的表象,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生存意志的表现和外化。然而,在为生存而战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女性的身体成了男性欲望角逐的场所、手段与目的而难逃被物化的命运。在英雄传说时代,埃塞俄比亚王后卡西奥佩娅因美貌而惹怒了海洋女神们,她只有把自己的女儿安德洛墨达交给海妖撕食,才得以平息海神波塞冬的愤怒而使王国免遭惩罚;英雄伯勒罗丰在杀死妖怪喀迈拉,战胜索吕摩人和阿玛琼女人,完成了吕基亚王伊奥巴忒斯的所有使命后,得到的奖品就是伊奥巴忒斯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迈锡尼王埃勒克特律翁可以把自己的女儿阿尔克墨涅许配给任何人为妻,只要这个人能替他报仇,杀死抢劫他牛群的特莱博埃人;特洛伊王拉俄墨冬只有牺牲自己的女儿赫西俄涅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免遭按宙斯的旨意来为他修建特洛伊城却没有得到酬劳的波塞冬和阿波罗这两位神祇的疯狂报复等等。神话生动形象的故事,反映了神话历史、文化语境里男权统治对女性身体的解构与颠覆,展示了女性在人类初始时期“无语”的生存境况下由“人”到“物”的悲剧性命运。

在《伊利亚特》中,女性虽然着墨不多,但她们无不是以“物”的形象出现的。在“金苹果事件”中,美女海伦被美神阿芙洛狄忒当作“礼物”赠给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并最终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在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中,海伦

[收稿日期] 2010-09-2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希腊神话中的女性政治家园”项目资助(编号:07C508)。

[作者简介] 李昌其(1968-),男,苗族,湖南麻阳人,怀化学院外语系讲师。

又被作为“奖品”置于“弗律基亚人的勇气和希腊人的武力之间”^[4]。作为一种象征,此时的海伦突破了可以框定女性的任何一种文化范畴。她既是男性发动战争的借口,也是男性情欲、荣誉的象征和男性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

另外,特洛伊战争中的各段重要插曲,无不围绕女性展开。在希腊联军奔赴特洛的前夕,统帅阿伽门农将自己的爱女伊非革涅亚作为牺牲献给了愤怒的女神阿尔忒弥斯,希腊舰队才得以顺风启航;在战争的第九年,因自己的“奖品”布里塞伊丝被阿伽门农抢走,阿喀琉斯愤然退出战斗而置联军的生死存亡于不顾;特洛伊沦陷后城市被劫掠焚毁,男子被斩尽杀绝,女人成了男人的战利品和“荣誉礼物”而被分配,甚至连特洛伊公主、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卡桑德拉也不能幸免,被阿伽门农强暴并沦为他的侍妾。

“她们都被史诗中的男性英雄世界边缘化,或成为战争的奖赏和原因,或是战争的鼓励和约束。和那些作战的男性勇士不一样,她们身上承载了更多的战争之苦。”^[5] 史诗将女性或置于普通的生活空间,或置于宏大的战争叙事场面,从隐性乃至显性层面都明显地烙上了古希腊时期男性中心文化共有的印记,再现了古希腊的社会风貌,展示了女性在至尊地位失落后,女性作为“他者”而被男性所构建、审视和消费,并最终被男性“物化”的悲剧命运。

二 织物与暴力的对话:找回自己的话语权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它是社会中所有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与权力不可分离:一方面,权力关系决定话语规则,话语就是权力的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文化生活的形式和范畴;另一方面,权力的施展不断创造新的话语,这些新的话语或者与权力达成共谋,或者与权力构成对抗。因此,话语又是权力的争夺对象,是权力的实现。

希腊神话故事展示的是男性话语下的英雄故事,是一种单一的性别文化,这种“菲勒斯中心”话语没有为女性提供说话的机会。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于男性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被压制的地位和被噤声的状态。然而,女性们并不甘心自己“失语”的现实命运,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另一种声音”,试图对抗、解构男性主流话语,争取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话语机会,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力。

菲罗墨拉的故事就是神话建构女性话语的一次大胆展示。故事中美丽柔弱的少女菲罗墨拉在遭到姐夫色雷斯王忒柔斯的暴行后,在痛苦的煎熬中用织机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遭遇编织出来,使得姐姐最终得知事实的真相,机智地把菲罗墨拉解救出来,并残忍地对忒柔斯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珀涅罗珀的织物”更是荷马史诗中最能代表这种女性话语的象征性篇章之一。史诗所述,珀涅罗珀在特洛伊城陷落后的十年里,为了拖延求婚人的狂妄要求,她以给公公拉埃尔特斯织寿衣为借口,开始了她那永远也织不完的纺织计。珀涅罗珀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计谋充分表明,“如果把纺织视为一种女性的语言,一种性别化的语言,女性通过各式各样的纺织(织、拆、再织),在一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佩涅洛佩的这一纺织活动,便表现出了

一种特定的属于女性的智慧。”^[6]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以独特的话语巧妙地介入和修正了这个被男性分派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拆卸了男性的权力话语,为自己赢得了话语空间。

在神话中,如果说菲罗墨拉、珀涅罗珀等女性的织物代表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以“智慧”消解男性主流话语,为女性自己争取话语空间而达成的“共谋”,那么,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复仇女神等的行为则代表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以“暴力”讨伐男性主流话语,为女性赢得自身权力而进行的“对话”。

神话中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妻子,对阿伽门农杀女祭神怀恨在心。在阿伽门农征战特洛伊期间,不守妇德,与阿伽门农的堂弟埃吉斯托斯通奸,统治王国。在十年后阿伽门农攻陷特洛伊,带着“战利品”卡桑德拉回家之际,设计杀死了阿伽门农,为女儿伊非革涅亚报了仇。

复仇女神阿勒克图、墨纪拉和底西福涅是黑夜的女儿,她们的任务是追捕并惩罚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无论罪人在哪里,她们总会跟着他,使他的良心受到痛悔的煎熬。神话中着墨最多的是她们对杀母罪人俄瑞斯忒斯的疯狂追杀。据神话所述,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杀夫为女报仇之举又招致了儿子俄瑞斯忒斯的血腥报复。俄瑞斯忒斯在长大成人后施以巧计,毫不留情地杀死了母亲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这一弑母暴行招致了复仇女神的疯狂报复。无论俄瑞斯忒斯逃到哪里,她们总是跟着他,使他痛悔和发疯。即使在雅典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俄瑞斯忒斯无罪时,她们也毫不让步,愤怒地威胁说要将整个希腊地区变成不毛之地和一片苦海,因为法庭剥夺了她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对罪犯施加残酷惩罚的权力。

在这里,原本属于“私人性”的家庭伦理关系演变成了“公共性”的政治关系,其本质上正是一场话语权的文化冲突与“对话”。审判的结果虽然表明,一个古老的、陈旧的母系制度已被宣判死刑,新生的、充满力量的父权制已经诞生。正如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性的失败。”^[7] 但神话中塑造的这类女性,她们既不顺从男性,也不放弃自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实现自己的意志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暴力”方式和大无畏的勇气与男性话语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她们破坏了当时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使在男性话语逐渐成为神话时代意识形态主流话语之后,女性话语不被完全遮蔽和消解。

三 安提戈涅:你为谁辩护?

福柯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建构物。文学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统治性权力话语对他异性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以化解这些他异因素。这一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把握作品中不同人物形象的话语特征,去分析人们言谈时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

悲剧《安提戈涅》打破了神话中把女性的视野固化在感

觉、情绪的框架的局限,而是以女性少有的果敢、魄力,把女性的伦理观、价值观和男性政治、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肯定了女性的话语能力和权力空间。

在神话中,安提戈涅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义无反顾地去埋葬因攻打忒拜城而被暴尸荒野的哥哥波吕涅克斯,这一行为正是对她的舅舅——以忒拜城之王据称的男性权力的公然对抗与拆解。因为就安提戈涅而言,作为死者的妹妹,她负有掩埋哥哥尸体的道德义务,而作为波吕涅克斯舅舅的克瑞翁也负有埋葬死者的宗教义务,她遵守的这一原则是人类初始时期母系社会所遵从的人神共处的神际法则;但就克瑞翁而言,波吕涅克斯是城邦的叛徒和敌人,是城邦的毁灭者,他应该被横尸荒野而不被任何人掩埋,他遵守的这一原则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主流话语下人类必须遵从的人际法则。在克瑞翁的男性意识中,安提戈涅只不过是播种的土地、男性力量驯服的对象,他为了维护其男性秩序的权威“宁可被一个男人打败”,而“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女人面前后退”^{[8] 287},并且只要他还活着,“决不让女人做主人”^{[8] 277}。

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英雄传说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早已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神话也不可能框定女性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或“真理”。也就是说,在这一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安提戈涅的失败是注定的。但悲剧通过安提戈涅的受难,惊人一致的结局又使悲剧将掌权者/施虐者与受害者/受虐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儿子海蒙为安提戈涅殉情而死,妻子因海蒙之死自杀身亡。克瑞翁没有胜者的喜悦和自豪,有的只是败者的失意与颓丧“一个人最好是终身遵从古老的神律”^{[8] 314}。他从当初极力反对安提戈涅最终走向对安提戈涅的认同。

在这里,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明显超越了神际法则与人际法则或“神”“人”冲突的传统视域,而质变成男性与女性权力话语的又一正面交锋。在这一交锋中,安提戈涅从单一的性别立场走向了政治和性别的双向立场,以“死亡”这一特殊“话语”肢解了克瑞翁的男性权力话语逻辑和话语基础,使他的权力与真理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支离破碎,并最终使他所执着的男权政治最终瓦解。故事虽然以悲剧结尾,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正是对神话中以往纤弱失语的女性形象的一种文化超越。

四 美狄亚:生命的危机与出路

《美狄亚》是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悲剧从美狄亚爱上英雄伊阿宋、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与伊阿宋私奔到杀子复仇等婚爱悲剧和人生悲剧,通过特定时空中女性个体扭曲的人生轨迹,演绎了那个特定时代不同女性相似的生命危机及出路。

首先,悲剧置美狄亚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她是远离希腊文明世界科尔喀斯国这一蛮族地域的公主,但她身上却有着不可扼制的个人欲求、炽烈的爱情、奔放的个

性、强烈的个人意志等典型的希腊人的性格。为了爱情,她公然背叛自己的父亲,帮助伊阿宋夺得金羊毛、杀死自己的亲兄弟阿布叙尔托斯,帮助伊阿宋复仇杀死不守诺言的伊奥尔科斯国王佩利阿斯,与伊阿宋一起逃亡到邻近的科林斯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美狄亚的种种付出并没有换来她的幸福人生。几年后,伊阿宋背叛了美狄亚和自己的誓言,决定迎娶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格劳克为新的妻子,同时国王克瑞翁宣布将美狄亚驱赶出国。此时的美狄亚既不属于科尔喀斯,也不属于伊奥尔科斯,更不属于科林斯,“没有祖国,没有家,没有一个逃避苦难的地方”^{[9] 461}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剥夺了她生命的归宿。黑格尔说过,“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火焰被第一阵风吹熄掉。”^[10]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人物的品质和行动。美狄亚爱情至上、自私冷酷,注定了她的生命步入了一条永不回头的不归路,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其次,悲剧同时也置美狄亚于一场可怕的身份危机之中。正如神话所交代,她是科尔喀斯国的公主,太阳神的孙女,月神的祭司。她的身份“类属”既不是神圣的女神,也不是普通的女人,而是男性文化中其活动总是与邪恶相关联的女巫;在阿尔戈众英雄的眼里,她只是一个魔术师,一个能够为他们夺取金羊毛的工具而已;在伊奥尔科斯,她只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无所不能的女巫婆;在伊阿宋背叛她并准备迎娶科林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格劳克之后,她又成了克瑞翁潜意识里能够毁灭他们众人的大魔头……。不同角色的频频变更,将美狄亚置于一种深重的身份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使她痛不欲生。她由衷地发出“在一切有灵性的生物中,我们女人是最不幸的”^{[9] 494}的悲叹。悲愤的台词既是对自己悲剧人生的清醒认识,也是对当时社会形态下所有女性所注定的悲剧命运的概括性总结。

西蒙·波伏娃认为,人的性别与社会文化构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于男性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被压抑的“他者”位置。女性要想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获得平等的文化地位和发展权利,首先需要对抗、解构主流话语^[11]。面对身份与生存这双重的危机,美狄亚所具有的叛逆性格注定了她决不会顺从当时社会男性的主流声音。她设计杀死了格劳克和克瑞翁,并在无比悲痛中亲手杀死了自己与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儿子,然后乘上龙车逃走。伊阿宋也在痛悔与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悲剧里的复仇行为已由美狄亚的个人复仇演变成了她对整个男性世界的报复。她无情地撕开了男性世界邪恶、虚伪的权力面纱,以残酷的复仇赢得自己的尊严与自决。正如有学者指出,“美狄亚的反抗超出了个人复仇的狭隘范围,从而体现着即将退出主导地位的女性对取而代之的男性的反抗;也体现了一个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孤单女子对强权社会的抗争。”^[1]悲剧中我们看到了宏大的叙事背后女性的深重苦难,以及在男性历史文化的语境里女性对男性神话的颠覆性、解构性力量,以及女性的性别自觉和生存出路。

妇女的处境是经济、政治、宗教等多种文化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希腊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文学艺术上的曲折反映,并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一再被后人所阐释、重构和复制。神话中的各种女性悲剧性抗争故事,就总体来说,虽然没有构成神话的叙事主体,故事叙事态度也很难用“女性主义”等术语来加以廓定,但却清晰地勾勒出了神话语境中一个独特的女性场域,充分展示了人类社会初期以男权为核心构建起的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的解构性力量及悲剧命运,为后世正确认识女性、解读女性提供了文化依据。

[参考文献]

- [1] 刘绿宇. 古希腊文学中女性主体地位的演变[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8(6): 69-70.
- [2] 蒋承勇.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 从古希腊到18世纪[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0.
- [3] 罗 婷. 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5.
- [4] 古希腊悲喜剧全集(3)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544.
- [5] 陈戎女. 《伊利亚特》中的女性[J]. 求是学刊, 2008(3): 116-120.
- [6] 陈戎女. 佩涅洛佩的纺织和梦——论《奥德赛》的女性主义[J]. 外国文学说评论, 2008(2): 124-135.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2.
- [8] 古希腊悲喜剧全集(2)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9] 古希腊悲喜剧全集(4)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10] 黑格尔. 美学(第2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27.
- [11] 黄 华. 权力, 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2.

The Elegy of “the Othe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truggles of women in the Greek mythology

LI Chang-qi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genre of tragedy, the Greek mythology reveals women's tragic fate and their struggles in a male-centered society through a great deal of pathetic stories, and interprets the reasonable demand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ggles of women from cultural dimensions.

Key words: tragic fate; voice; cultural transcendence; crisis and solution